

杨新容校长毕生育才，风范长存(四)

~~ 印尼杰出华校精英风雨人生介绍之七

领东南亚各地大肆搜捕各族抗日人士，取缔所有报纸杂志与包括华侨学校在内的各类学校。因而，迫使各地抗日组织的成员和其他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化、新闻、教育界人士和爱国华侨出走避难，许多人因而失业，生活陷入困境。杨新容、叶景宗等于1942年2月中旬也避居西爪哇牙律市山区的芝加漳镇。他们在山上租地种植蔬菜，维持生计，生活相当艰难，但坚持民族气节，坚决不与日军当局妥协。为了取得一个合法的公开职业掩护，尽快把流离各处生活陷入困境的许多抗日进步青年重新汇集起来，成立一个有统一领导的地下抗日组织，团结各阶层华侨进行反日斗争，为此，杨新容他们在芝加漳学会了制作蛋糕的手艺。从当地侨生方汉金先生处学习了以木薯干粉代替面粉为原料制作蛋糕工艺，这种蛋糕口感好，成本低，并由叶景宗出面向亲人借得300盾作为资本，于1943年初相偕迁回巴城，并借用一侨商住宅办起了爪哇首家“大不同蛋糕厂”。主持人杨新容、叶景宗，还有颜传锵、黄锦兴、李崇礼等一些抗日进步青年朋友参加。蛋糕厂开办后，销路很好，此手艺迅速传授给各地的

抗日进步朋友，并将头年赚得的5,000盾分发给各地作为开办蛋糕厂的经费。于是万隆、泗水、梭罗、日惹、三宝垄、玛琅、谏义里等地都办起了蛋糕厂。各地蛋糕厂的建立，既稳定了各地许多抗日进步青年的生活，又为联络掩护各地朋友提供场所，蛋糕厂成为积聚各地华侨反日力量，恢复和发展各地华侨抗日组织的重要据点。1943年年底，杨新容会同洪骏声、林降祥、郑曼如等同志研究讨论了新形势下统一全爪哇华侨地下抗日组织的问题，经过积极筹备，随即在牙律召开了各地抗日组织的代表会议，与会者即有：洪骏声、林降祥、郑曼如、詹培、叶骥才、苏朝源等十余人，决定统一各地抗日组织的名称，定名为“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简称“民大”），并通过了“民大”章程，提出了“团结全体华侨，联合印尼民族共同抗日”的口号，明确了当务之急是“宣传并拥护祖国的团结抗战”、“抵制日军侵略，孤立和打击日军。”会上通过了建立“民大”总支部为领导核心，一致推选了杨新容为总支部书记、洪骏声为副书记、林降祥为组织委员、郑曼如为宣传委员、苏朝源为青

年委员、詹培为联络委员，下设西爪哇、中爪哇和东爪哇三个支部，杨新容、林降祥、郑曼如分别兼任西爪、东爪、中爪的支部书记。从此之后，“民大”以三三制的小组方式开展秘密活动，以秘密工作的组织纪律教育“民大”组织成员，组织学习进步书报及有关著作。并秘密收听联军广播，油印传单宣传反法西斯战争的捷报，揭露日军的残暴统治。1944年10月，由于汉奸邹志模的告密，巴城“民大”的一个小组被日本海军部破获，陈纪煌、沈旺金和陈裕和被捕，经受严刑拷打，三位同志坚贞不屈，拒不泄密，保护了组织。但沈旺金终因伤重不治于1945年6月在狱中英勇牺牲，另二人被关押至日军投降后始获释放。

“民大”及时吸取了这次教训，从巴城和泗水二地分别派出部分赴爪哇各地组织采取更隐蔽的形式开展抗日斗争，从而使“民大”的组织在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继续不断发展，很快就遍及全爪哇的城市与乡镇成员发展到1,000余人。日军南侵后，因渣华轮船停航，使詹培滞留于爪哇，抗日组织与国内的联系中断。然而到1944年底，国际形势的

发展日益有利于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迫切需要有更严密的抗日组织来统一领导爪哇的华侨爱国抗日队伍。“民大”核心领导人杨新容联络了洪骏声、林降祥、詹培、梁新等，于1945年1月在万隆的“大中贸易有限公司”所属“友声包茶厂”召开了“民大”的扩大干部会，经过认真总结各地组织的工作，一致认为“民大”组织要适应形势迅速发展的要求。急需加强组织领导，有必要建立新的进步组织。于是决定成立筹备机构，一方面起草纲领和章程，一方面以各地“民大”组织为基础，吸收积极分子作为基层组织的核心。把办好这两件事作为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前的主要任务。会上推选了杨新容、洪骏声、林降祥和郑曼如四人为纲领章程的起草委员，并议定同年

6月25日至27日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经过紧张筹备，第二次筹备会议如期在万隆秘密召开。与会同志肯定了筹建新的进步组织的必要性，会议审查修改了纲领章程，选出了七人筹委，杨新容为书记，洪骏声为交通联络委员，林降祥为组织委员，郑曼如为宣传委员，苏朝源为青年委员，叶骥才为财经委员，詹培为劳工委员，并决定东爪哇由林降祥、詹培、洪骏声三人负责，林降祥兼任书记；中爪哇由郑曼如、李重生、梁迈三人负责，郑曼如兼任书记；西爪哇由杨新容、梁新和苏朝源三人负责，杨新容兼任书记。新的进步组织的成立，为迎接战后印尼华侨爱国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未完 下期待续）



杨新容摄于1980年